

作者—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

譯者—高 鈺、王宏周、魏章玲

校閱—林劍秋

#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後工業社會的觀念並不是對未來的某種特定時間的預言，  
而只是個推測性的描繪，  
是根據剛出現的一些特徵所建構的一種假設，  
就此我們可以評估若干年後的社會事實，  
在適時與假定的比較之下，  
找出影響社會變遷的運作因素。

## 關於本書

本書作者以完全不同但承自於工業社會的知識概念來思索未來。他強調了四個面向：服務業經濟、專業技術階級的興起、新智識技術的產生以及理論性知識的首要性，以作為未來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徵。這本書精確地分析西方社會結構的變遷，更以及富前瞻性的觀點指出未來我們將要面臨的問題。

ISBN 957-55-1306-1



原加編號

08706

#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

著——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譯——高銜 王宏周 魏章玲

校訂——林劍秋



08706

##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

- 著者——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  
譯者——高銜 王宏周 魏章玲  
校訂——林劍秋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話——02-22193338 02-23631407  
購書專線——02-22186492  
傳真——02-22182859~60  
郵政劃撥——0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海王印刷廠  
裝訂廠——欣亞裝訂公司  
初版一刷——1995 年 5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http://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cate@laureate.com.tw](mailto:laurcate@laureate.com.tw)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306-1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Copyright ©1973 by Daniel Bell

Foreword ©1976 by Daniel Bell

©1995 Chinese copyright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爲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菁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憑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爲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主。爲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爲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衆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



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出版單位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爲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爲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者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爲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窒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社會學召集人序

本書的宗旨，是力求闡明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的進程中（農業社會過去被簡單地定義為，絕大多數人口以土地為生的狀態），土地貴族和農民階級在政治舞台上飾演的種種角色。更準確地說，本書力圖揭示這個或那個農村階層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從而影響議會民主西方巴力門式（Parliamentary democracy），以及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和左翼共產主義專政政權的出現？

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者來說，任何問題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在這裡，有必要簡略地談談本書的構思。早在動筆著述十多年前，我便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s）主要淵源於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這個命題產生了懷疑。事情是明顯的，當俄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創立政權之際，這兩個國家完全是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我很久以來便確信，對政治制度的充分理解，必須建立在了解亞洲的風俗制度與歷史的基礎上。因此就有必要考察生活在農村的階級集團中崛起了何種政治勢力，以及對亞洲社會予以同等關注，這至少將會是一種頗有希望的研究戰略。

本書第一部分，首先致力於探討英國、美國和法國向現代社會演進的資本主義途徑。我原本打算在結束這一部分時，以同樣的篇幅研究一下德國和俄國，以揭示歐洲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的社會起源，這是完全不同於議會民主道路的。但我最後還是決定割愛，首先是因為這本書已經相當厚，其次是由於寫作過程中第一手資料顯得愈益重要，沒有這些我不可能向壁虛構地解釋兩個國家的社會歷史。然而，爲了進行比較考察和理論研討，我在第三部分中還是大量引證了德國和俄國的材料。我對兩國社會史的論述是以文獻索引中例舉的史料爲基礎的。略去了德國史和俄國史的舖陳敷衍，起碼可以獲得某種補償，以便更深入地對日本、中國和印度的亞洲式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議會民主道路進行探索，這裡的農民問題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由於在西方有教養的讀者圈中，以上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很大程度上仍屬於未知領域，這樣，批評界對於一位知之不多卻侃侃而談的作者，也多少會顯得寬大爲懷。

對於一個人的能力來說，這個課題系列未免過於寬泛，而要形成有意義的概括，這個課題卻又顯得過於狹小。這是人們對上述選題可能提出的質疑。關於任務艱鉅令人難以勝任的意見，筆者不只一次地表示同意。第二類批評通常指出：瑞士、斯堪的那維亞諸國和低地國家等民主小國，以及古巴、東歐衛星國、北越、北朝鮮等共產主義取勝或控制下的較小地區，均未納入研究視野。而排除了這些地區和國家，怎麼概括西方民主的成長和共產主義的演進呢？忽略了那些西方民主小國，難道不會使本書沾染某種反農民的傾向嗎？關於這種意見，我想，應該可以持論公允地加以回答。我的研究集中於社會漫長進程中的某些重要階段，這個進程在一些國家業已結束，而部分進程在新的社會格局中以暴力方式和其它方式繼續推進，因此，二十世紀上半葉一些國家政治領導人處在截然不同的位置上。他們的興趣所在，是發明種種攫取政治權力的方法，而不是接受和傳播其他地區已形成的體制，除非這可以使他們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建立起強大的權力。小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屈從於大國和強國的事實，意味著小國政治

中的支配因素在其國界以外，這也同時意味著小國的政治課題同大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此，某種既包括大國又包括小國、關於民主與專制前題的一般性敘述，很可能會由於泛泛而成爲一種抽象的陳腔濫調。

基於這種看法，剖析個別國家農業社會的過渡，得出的結論至少應和廣泛概括具有同等價值。例如，了解英國農村問題的解決對於議會民主制的影響，以及印度未能成功地解決農村困境對民主所構成的威脅，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而且，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理應開闢自己的前進道路，這很難用某種一般理論去套。恰恰相反，過分熱衷於理論往往會造成誇大某些與理論相吻合的事實的危險，以致使這些事實的重要性超越了個別國家的歷史解釋條件。由於這些原因，本書將以大部篇幅具體地闡釋一些國家的過渡進程。

在致力於國別史的探討時，比較研究會有助於人們提出很有價值的，且有時甚至是意義全新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比較考察可爲公認的歷史解釋提供初步的否證。比較研究還可以引出新的歷史概括。在實踐中，這些特點貫穿於整個思維過程之中，使得這樣一種研究既區別於也優越於有趣實例的堆砌。例如，雖然印度農民和十九、二十世紀中國農民大致經歷了同樣的苦難，但他們卻不層爆發群衆性的革命運動。注意這一點，人們便會對解釋兩個社會中所發生事件的傳統說法感到奇怪，並且留意其他國家引發農民起義的各種因素，以求尋找某種普遍性的原因。又比如，研究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曾給民主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德國工業農業菁英的聯盟，即衆說紛紜的鋼鐵和黑麥的聯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人們會奇怪，爲什麼在美國鋼鐵和棉花的聯姻，卻不曾阻止內戰的爆發呢？這樣，人們便深入到西方民主的歷史條件中。毫無疑問地，這種比較研究並不取代對具體案例的細節考察。

有效的概括，猶如一幅飛行員用以穿越大陸的大比例地圖，對於某些目的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更精確的地圖之於其它目的必不可少一樣。人們在初步尋找地理方位時，並不需要確切了解每座房屋和每條小路的位置。而當一位探險者邁開雙腿——也就是說，當一位比較歷史學者要準確地、大規模地鑽研歷史時，搞清楚細節就成了他的首要目標。各種枝節的意義及其相互關係是慢慢地浮現出來的。專家們棲居在猶如茫茫森林般的史料中彼此爭辯不休，一位探索者在這裡有很長一段時間會有迷途之感，沒有一番挫折，他很難從這種境遇中擺脫出來，假使他根據自己的遊歷繪製一幅地圖，一位本地居民便會振振有詞地指責，他忽略了自己的小屋和空地。遺憾的是，這位探索者確曾在那個地方發現過許多食物和飲料。倘若在旅程終點，那個探險家試圖為初來者簡要地講解一番他所目睹的奇聞軼事，批評之聲很可能會接腫而至。確切地說，這正是眼下我所要從事的工作：這就是用粗略的筆觸勾畫出我的主要發現，從而為讀者提供一份我們共同探索領域的簡單地圖。

人們從這裡所研討的一系列歷史實例中，可以分辨出由前工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推進的三條主要的歷史路線。其中第一條道路，是通過所謂資產階級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來開闢的。撇開事實不談，「資產階級革命」這個用語由於其馬克斯主義內涵，被許多學者看成一面紅色的旗幟，它還含有種種模糊之處和貶損之意。然而，出於正當的研究理由，我認為，用這來指稱英美法走向現代工業民主社會的路途中所發生的歷次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歷史學家通常把「革命」一詞同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亦常被稱為英國內戰）、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聯繫在一起。這類革命的關鍵特徵是，興起了一個有著獨立經濟基礎的社會集團，它摧毀了來自既往的對於民主資本主義的種種阻障。雖然城市中的工商業資產階級提供了主要動力，但這遠遠非

歷史的全部內容。從歷史的一個場景到另一個場景，資產階級力量所找到的盟友、所遭遇的敵手，迅速變化著。我們從一開始便予以重點關注的土地貴族，或是像英格蘭那樣構成資本主義民主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或是站在反對立場上，在內戰和革命的災變中被掃地出門。農民也同樣如此。要麼是他們的政治奮鬥同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大方向一致，要麼他們只是一般無關緊要的力量。其所以無足輕重，或是因為農民社會在資本主義進程中遭到了毀滅，或者就是因為在一個像美國那樣的新興國家裡，資本主義啓始時真正的農民階層還不存在。在大革命和內戰開闢的第一條早期路線中，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聯袂而行。

經由巨大的革命與內戰而產生的第一條與最早的路線，導致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的聯合；第二條路線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卻經由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達到頂峰，德國和日本是明顯的例證。基於前述理由，本書只對日本加以詳細研究。我把這條路線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反動形式，和上面談到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形式相並列。在這類國家裡，資產階級的力量相當薄弱，如果它採取徹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勢必夭折。相對軟弱的工商階級日後的使命，依賴於依舊居主宰地位的舊統治者中的異端分子，他們主要來自土地，在準議會政權 (semi-parliamentary regime) 的支持下，促成了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政治經濟變化。在這種統治的庇護下，工業發展頗為迅速，但結局是經歷了短暫和脆弱的民主時期後便成為法西斯主義。第三條道路自然是以俄國和中國為典型的共產主義。兩國強大的農業官僚主義禁錮著商業以及爾後的工業發展。這種情況甚至超過了前面兩種類型。由此產生了雙重後果：第一，資產階級過於軟弱，他們在現代進程中甚至不能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充當一個二流夥伴，儘管有這方面的嘗試；第二，由於在朝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連最軟弱無力的步子也還沒有邁出，反而積聚了大批農民。面對現代世界的入侵，農民階層備遭壓迫，

戴上新的鎖枷。他們在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下，為推翻舊秩序和推動國家進入新時代提供了毀滅性的革命力量，與此同時，也成了第一批犧牲品。

最後，我們仍然可以查覺到印度是用以解釋朝向現代化的微弱推動力量的第四種模式。至今，它仍然沒有來自上層或下層的資本主義革命，也沒有出現導向共產主義的一個農民階層。同樣地，朝向現代化的推動力仍是微弱的。另一方面，至少某些西方民主的歷史先決條件卻真正地出現了。一個巴力門政權已存在了好些時候，而且已不僅僅只是個門面而已。因為印度現代化的動力是最微弱的，而這一例證的成立與任何理論架構大相逕庭，因之，似乎可以用這一例證以建構適用於其他地區的理論架構。同時，它也可以做為對這種通則化(*generalization*)的一個極佳判準。在嘗試了解農民革命上它特別有用，因為印度農村的悲慘程度約與中國相當，而前者未曾出現農民革命，後者的農民起義與革命在前現代(*premodern*)及現代都有著決定性力量。

盡量簡要地總結一下，我們試圖說明在導致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在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半調子資產階級革命(*abortive bourgeois revolution*)中，以及在導致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中，土地貴族和農民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對於農業商品經濟挑戰的回應，成為左右政局的決定性因素。以上從政治上出發的表記能否引申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這些運動是否都包含這些成分，我希望在以後的討論中會愈益明確起來。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在一定情形、一種狀態下居主導地位，但在其他的國家裡，人們會發現次要因素有可能成為主要因素。在法國革命後期和拿破崙戰爭以後的英格蘭，便存在著某種反動因素——一種針對城鄉下層階級的舊式土地貴族和新興工商業菁英的聯盟（在某些情形下他們也間或取得下層階級的支持）。是的！這種反動要素的結合在研究每個社會時都會



發現，甚至連美國也不例外。而這種反動特徵在德國是主流。進一步的探討還可以看到，法國絕對君主制同沙俄及中華帝國的君主官僚體制對於商品經濟的影響如出一轍，這類的觀察使人們相信，某種基本的經驗歸類有可能超越對特例的研究。

無論如何，在要求正確解釋歷史特例與尋找通則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緊張性，主要原因在於，在將特殊問題全部審視完畢以前，不可能知道某一特殊問題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這種緊張性還由於缺乏精當的表述，對這一點我深以為憾，但雖然幾經改寫仍然未能免除這種缺欠。這裡，不妨仍以探索蠻荒之地打個比方，探索者並沒有為以後的旅遊隊修築一條平坦的直達公路。假使他擔任嚮導，只要不致徒勞無益地走回頭路，避免頭一次探險時所犯下的種種錯誤，有禮貌地帶領隊伍繞過可怕的荊棘，在引導隊伍小心翼翼地行進時指出危險的陷阱，那麼，就可以認為他已經適當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假如他不慎失足跌入陷阱，那麼同伴們不只對他的跌跤報以笑聲，而且也伸出救援之手幫他繼續上路。可以說，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正是要獻給這樣一支探索真理的隊伍。

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在時間上為我提供了寶貴的支持。他們積極贊助和關切本書的寫作，沒有流露絲毫不耐煩的跡象。我特別感謝研究中心的某些工作人員，這本書就是在他們任職期間完成的。威廉·朗格(William L. Langer)、莫勒·費恩索德(Merle Fainsod)和阿伯讓·伯格森(Abram Bergson)教授是本書寫作的研究指導，馬歇爾·沙爾門(Marshall D. Shulman)是副研究指導。羅斯·迪伯涅德赫(Rose DiBenedetto)小姐花費休息時間異常耐心地反覆打印了這本書的無數頁手稿。

在全部研究過程中，我的至交好友赫伯特·馬庫色教授以熱情的支持和透徹的批評，給予我獨特的支持。即使在他對我的工